

ZHONGGONGZHONGYANGWENXIANYANJIUSHI
GERENKETICHENGGUOJ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个人课题成果集

2013年

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个人课题成果集

(2013年)

(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 . 2013 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科研管理部编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 - 7 - 5073 - 4150 - 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问题—调查报告—中国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1540 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 (2013)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

特邀编辑：唐 研 麻伯颜 翟佳琪

责任编辑：张文和

封面设计：李文娟

责任印制：寇 炫 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网 址：www.zywxpress.com

电子邮箱：zywx5073@126.com

销售热线：010 - 63097018、66183303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阳光图文设计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700 × 1000mm 16 开 61.5 印张 96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4150 - 8 定价： 130.00 元（上、下）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 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 李 琦 (1)
论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史全伟 (13)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国情观 李凤龙 (24)
论毛泽东对确立多党合作制的历史贡献 王 平 (36)
试论毛泽东处理西藏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 李 珍 (49)
毛泽东对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魏 芬 (71)
浅析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经济思想
——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切入点 龚格格 (87)
毛泽东与延安学习运动 王春明 (98)
重温《为人民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党
——试析《为人民服务》一文对建设马克思主义
服务型政党的启示 胡昌勇 (111)
延安时期毛泽东书法风格嬗变研究 陶永祥 (123)
毛泽东与新中国初期的镇反运动 王玉强 (134)
毛泽东与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 何永锋 (154)
1957年毛泽东决策开门整风的原因探析 付 闪 (163)
从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时代
文化的发展变迁 王为衡 (176)
刘少奇与1962年经济大调整 杨志强 (201)
朱德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 谭幼萍 (214)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在中央决策层

- 兼论任弼时的政策思想 蔡庆新 (225)
论第一代领导人的中国现代化设想 孙东升 (239)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发展 曹前发 (251)
中共七届中央书记处与青年团的重建 朱舒坤 (265)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城市接管问题研究 吕臻 (281)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绩效分析 祝志伟 (298)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述论 高阳 (309)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政策变迁及其评价 刘丽娟 (324)
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形成和改变 单劲松 (337)
浅析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性模糊
——以 1958 年台海危机为例 张长江 (352)
1961—1962：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朱薇 (362)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对非援助述论
——以几内亚为例 李红喜 (378)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南亚因素 潘敬国 (391)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
——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前提的
思考及启示 张曙 (402)
“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思想
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郝首栋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起点
——邓小平改革“宣言书”的政治解读 王香平 (431)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周锟 (443)
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
——邓小平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考和启示 王达阳 (455)
浅析邓小平机构改革思想 刘刚 (465)
邓小平与 1982 年宪法的制定及其历史影响 孔昕 (476)
邓小平引进国外智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纪念邓小平“引进国外智力谈话”30 周年 梁晨 (487)

目 录

十二大前后中美苏“大三角”中的邓小平	董振瑞 (497)
邓小平与创办海南经济特区战略决策	吴振兴 (512)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论邓小平与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的确立	刘贵军 (523)
陈云对新时期党建科学化的贡献	赵士刚 (544)
陈云对新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贡献	曾 琪 (559)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怎样认识和应对新科技革命的 ..	许先春 (570)
江泽民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思想初探	迟爱萍 (586)
江泽民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	梁 营 (598)
严明党的纪律 维护中央权威	
——江泽民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	
思想探析	胡晓青 (608)
江泽民与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调适	
——以克林顿时期中美元首外交为中心的考察	尹 航 (61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若干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毛 胜 (640)
简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掌握对外开放	
主动权的思想	王德蓉 (651)
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我国发展尖端武器的战略	
决策与思考	毕 烨 (663)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探索之路	
——以我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为例	屈 婷 (677)
从全能到服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	
政府职能及其转变	石建国 (687)
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党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思路	
——以 1992—2002 年为时间段	宿 凌 (7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朱 磊 (710)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述论	韩洪洪 (722)
“顺应潮流 乘势而上”	
——浅析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党对全球信息化的	
认识及应对	卢 佳 (739)

协调发展：我国发展全局的大战略大思路

- 胡锦涛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思想研究 张明杰 (751)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研究 何树平 (761)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述要 戚义明 (787)
十六大以来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
 历史进程简述 徐 珊 (801)
新中国对社会管理的艰辛探索及重要启示 陈 理 (820)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展望 赵 宇 (834)
新时期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战略决策过程 武茂昌 (848)
基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当代中国和西方国家
 民主政治建设比较研究 陈维义 (860)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论略 武志军 (874)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程和展望 王 骏 (881)
从“一个中国框架”的提出看中央对台政策
 及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 王淑翩 (891)
对和平发展背景下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 邵建斌 (902)
“切实维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安全”
 ——理解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视角 郭如才 (914)
从庙会的变迁看中国共产党的民俗文化观 翟佳琪 (928)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浅析 刘志辉 (940)
2012年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研究述评 王 翠 (957)

十二大前后中美苏“大三角”中的邓小平

董振瑞

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终止于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此间近20年，虽然强弱不同、实力不等，但中美苏三国却因其对全球政治特别是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战略三角”。^①由于美苏矛盾是整个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在“战略三角”中美苏矛盾依然居于主导地位。美苏矛盾制约中美矛盾和中苏矛盾，中美和中苏矛盾则受制于美苏矛盾。

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立足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立足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牢牢抓住美苏矛盾这个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同时依据两国攻守形势的发展演变及其各自对华政策的发展变化，不仅适时调整了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苏政策，还适时对“战争”、“和平”及“发展”等有关时代主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而为新时期

^① 1969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就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进行研究。经过十几次讨论，四位元帅先后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颗珍宝树》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并较早地形成了“大三角”这一认识。报告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陈毅还据此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重要口头建议。因此，一般认为，中美苏“大三角”形成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终止于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中国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一、历史转折前后的“战略三角”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两国在不少领域展开了有益的合作。但是，当1975年毛泽东讥讽美国人“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①之时，中美关系却由于美国奉行对苏“缓和”政策而踟蹰不前。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苏联的“咄咄逼人”，世界战略格局及美苏关系均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政治愈来愈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美苏间的这种战略关系，使其各自的对华政策分野明显：

处“守”势的美国认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不仅会大大增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稳定，“更广地说，它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合作同苏联的竞争”。^②

处“攻”势的苏联则继续其以往的对华政策：一面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压力；另一面，又竭力防止中美结成反苏的战略联盟，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努力。

在此背景下，“战略三角”的基本态势是：美苏争夺加剧；中苏继续尖锐对立；中美则出现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

1. 历史转折的实现与邓小平对“战略三角”的基本评估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此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成为邓小平最为重视的一个中心问题。为此，他大声疾呼：“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③但是，在当时的历史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5页。

② 参见倪孝铨、（美）罗伯特·罗斯：《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8—209页。

条件下，要确保这一“千秋大业”，却有两个不得不通盘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一，安全因素。难以设想，在其时中苏尖锐对立，苏联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安心地、集中精力地搞现代化建设。因此，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对苏外交。

第二，经济因素。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资金、技术和市场等便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又被认为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潜在重要市场和外来投资、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因此，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对美外交。

在历史转折前后，基于对上述两个因素的评估，党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必须坚定地构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一条线”；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改善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对此，邓小平有代表性地这样总结：“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①“战略上，我们的观点明确得很。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②

2. 对美外交：“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

整个70年代，中美关系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那种“缓和”局面。尤出预料的是，随着苏联把霸权触角逐步伸向中东、南亚等战略要地时，到70年代末美国内舆论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苏联因美国的“缓和”政策得了利，美国则吃了亏。在此背景下，为稳定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并扩展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美国感到有必要尽快改善对华关系。为此，卡特总统甚至公开宣布：“我们认为中美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③

对“战略三角”出现的这些新的动向，邓小平十分敏感。在他看来，随着美苏争夺加剧，美国为平衡其全球利益，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③ 《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特别是对华政策；这种调整，是美国现实的战略需要；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存在着向前继续发展以至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对北部一线正承受着苏联强大压力、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在对美外交上，他明确提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① 的指导思想，并为此采取了两手卓有成效的举措：

第一手，在苏联凌厉的扩张势头下，他抓住美国奉行对苏“缓和”不利的被动局面，向美方反复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利益上的共同点。为此，他一面用辛辣的口吻高调批评苏联“横行霸道”、“屡造事端”、“更具冒险性”；另一面又毫不讳言地直言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②。并告诫美方：“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中美关系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外交问题，中美关系要从“战略上考虑”，不能从“从策略上考虑”。^③

第二手，在强调“不要错过机会”的同时，他还牢牢抓住“斗争”的一手，并十分注重“斗争”的艺术。为此，他一面抓住美国国内不断出现的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有利舆论，紧紧围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台湾问题，在坚定表达中方原则立场的同时，反复做美国人工作，以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早日实现。他说：“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④ 并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因此不要搞外交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断交、撤军、废约”三条。另一方面，在美苏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他又尽可能凸显中国在“战略三角”中所居的战略地位，并以此使外界全面认识中国所具备的战略实力。他说：“中国很穷，力量有限，但我们在国际上的问题，会根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立场，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⑤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③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618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329页。

在上述举措推动下，1978年7月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六个月后，中美正式建交。这意味着，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分歧依然十分严重，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方面这一共同战略利益上取得共识，并寻求合作。

3. 对苏外交：“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对“战略三角”的重大影响不言而喻。

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围绕反对霸权主义等问题，中美间进行了初步的外交协调。邓小平回国后不到十天，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中美苏三国随之展开了一轮激烈较量。但当苏联责问美国“邓小平访美两星期之后，中国就向苏联的一个盟国发起了军事进攻”^①之时，美国则不置可否地提出超级大国要保持克制，中国则公开表示：军事打击越南就是为了打击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②。显然，通过“摸老虎屁股”，中国在此轮“战略三角”的博弈中得了分。邓小平对此十分高兴。他表示，继承自毛泽东的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③

然而，“战略三角”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美即便能够“联手抗苏”，但是他们之间那些带根本性的矛盾却不可能消除。建交后不到四个月，围绕着《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中美之间便爆发了严重的外交争端。美国外交官更是毫不讳言地说中国将不得不“咽下这颗苦果”。

邓小平是一位有着清醒头脑的战略家。对此，他有着深刻认识。基于对“战略三角”的历史认知，早在访美之后他就已经明确提出：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国际环境。^④

①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②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71—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0页。

④ 参见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1979年6月，中苏决定举行两国国家关系谈判。邓小平对此次谈判高度重视。谈判前夕，他鲜有地、事无巨细地指出了中方在谈判中应采取的基本精神和具体策略，表示“中国不能同意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并强调：“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①看得出，在中美分歧日现的情况下，为遏制美国“压华”制苏的企图，邓小平决心通过中苏谈判这种特殊形式，一方面尽可能地“稳住苏联”，从而尽可能地解除中国周边的实际威胁，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另一方面，此举又在客观上起到了向美国传递中国所具备的战略能力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强决心。

在邓小平的重视下，中苏谈判于1979年10月拉开帷幕。然而，由于双方各执己见，经过六次正式会谈未能取得任何共识。次年初，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随即宣布中断谈判。^②可见，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战略三角”的力量评估，在邓小平看来，中美矛盾虽然升级，但在中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其矛盾仍然小于中苏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者，在美苏矛盾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对苏外交要“短暂”地服从于对美外交。

二、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的“危”与“机”

虽然中苏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善，但通过此举，中国却无疑增大了在对美外交中的回旋余地和筹码。

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由于美苏争夺加剧而出现了“更加紧张、更加动荡”的局面。更为戏剧性的是，美苏间的争霸态势也于同期经历着逆转。在此背景下，在“战略三角”中力量较弱的中国一方，“危”与“机”并存。

1. 美苏攻守形势的逆转及邓小平的利弊权衡

以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开始大幅调整其对苏战

^① 参见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80年1月21日。

略，对苏政策日趋强硬。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之后，美国的优势地位和战略主动逐步重新夺回。面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苏联一开始毫不示弱，以强硬对强硬。但是，由于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领导人的频繁变故等原因，苏联虽然仍倾其全力同美国争夺霸权，但其扩张势头已渐成强弩之末。在这种背景下，为挽回战略颓势，苏联开始不断调适它在“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并为此不断释放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

但是，在中苏关系改善出现重大历史机遇的同时，中美关系却波澜迭起。这主要表现在：随着对苏优势的重新确立，一些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认为“美国无求于中国”、而“中国有求于美国”，并冀图借此挟持中国的对苏立场，且幻想能“逼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让步。

对“战略三角”出现的这些新的动态，特别是对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所蕴含的“危”与“机”，邓小平看得十分深刻。对此，他入木三分地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① 并强调，中国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会低估自己的价值，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围绕上述问题，特别是围绕对美、对苏外交，在十二大前后的几年间，邓小平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观察、思考和利弊权衡。

2. 对美外交：“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里根上台之后，在对华问题上奉行所谓的“双轨”政策。即：一面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另一面却又声称中国不应该干涉美国的对台政策，并威胁要“充分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在此背景下，中美交锋在所难免。

事关国家主权，邓小平寸步不让。

一方面，他对美国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抨击，并公开表示“中国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说：“中美关系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考验时期，考验的题目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论点，就是只要美国对苏联强硬，美国不论怎么做，中国人都会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8页。

吞下去。这是不可能的。”^①并强调：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存在着使中美关系停滞和倒退的危险。

另一方面，针对中美关系的胶着状态，他又明确作出了对美关系“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的重要指示。他说，“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②并且还十分直率地表示，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③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围绕美国对台军售，经过近17个月的艰难博弈，中美双方最终于1982年8月签订了八一七公报。八一七公报的签订，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

3. 对苏外交：“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争斗渐趋白热化，特别是随着美苏攻守形势的渐次逆转，为防止“战略三角”出现失衡，邓小平开始更多地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和中苏关系的历史渊源去重新估量中苏关系。只是表现在行动上，这种“估量”仍旧显得十分谨慎。就此，他曾表示：“现在不存在中国和苏联合作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个格局不要变。”^④

但是，进入1982年以后，这种情况为之一变。

1982年3月24日，正当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矛盾急剧升级，并进行意志较量的最为紧张的时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却在中亚传递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明确信号。对苏联的这一“惊人”之举，中方迅即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在美苏争夺中，苏联已经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一步骤，在客观上为中国调整对苏关系提供了机会。^⑤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8页。

③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6、711页。

⑤ 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基于这一分析，邓小平果断加快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步伐：

3月25日，他即指示外交部要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立即作出反映，谈话要言简意赅，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应变。^①

4月16日，他又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并提出要苏方“先从一两件事做起”。^②

4月27日，在同金日成会谈时，他又明确表示中苏关系“总有一天要有所改善”。^③

7、8月间，他又进一步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④

在上述举措的有力推动下，8月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外交部派员去莫斯科向苏方口头转达了中国将认真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条件。十天之后，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⑤至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得以开启。

此时，距党的十二大召开还有十天。

三、“不结盟”与外交新局面的开创

中美《八一七公报》的签署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对“战略三角”，亦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对美、对苏外交的实践证明：在20世纪8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势头的增强，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以经济和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凸显，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内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可以通过执行合理的对外政策，并充分利用“战略三角”的基本属性和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博弈，形格势禁，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正常或者缓和的关系。

①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5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页。

④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页。

⑤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71—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页。

在这种思想认识之下，以往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所奉行的“结盟”或“准结盟”的政策，首次出现了调整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基于其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邓小平的利弊权衡，这一节点最终被定格于党的十二大。

1. 党的十二大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的外交经验，无外乎涉及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所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就是该如何认识和评估“战略三角”以及随之而来的“结盟”问题。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十二大在对外政策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这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在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这一讲话，不仅正式确定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也使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外交工作的实践，更加符合实际和富有成果。

第二，以“独立自主”为主旨集中阐述了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之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将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几十年来，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更加鲜明地坚持了这一对外政策，并赋予了它新的内容。^②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③十二大报告也强调，中国将“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④这意味着，作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外交战略，中国将更加强调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④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